



管律生平与宁夏摆边——兼论管律的安边策

发布日期：2006-4-26 15:53:45 作者：何兆吉

摘要：管律是明代宁夏一代名儒，撰有《嘉靖宁夏新志》8卷传世。本文利用新发现的文献史料对管律生平事迹进行了订补，同时对其戍边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管律提出的“守在德不在险”以及对“今摆边之谋，一举而五弊存焉”的观点，至今仍有借鉴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管律生平；宁夏摆边；质疑

中图分类号：K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6)01-0056-05

一、关于管律生平的两条史料

管律是明代宁夏一代名儒，文章勋业有主修《嘉靖宁夏新志》8卷传世，唯其生平家世却鲜为人知。陈明猷先生撰写“嘉靖宁夏新志的史料价值”用力甚勤，但对管律生平也只是说，“本书主要纂修者管律，宁夏人，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曾任刑科给事中”，可见简括之至。近期笔者在《杨一清集》中却意外发现其家世的两条史料，弥足珍贵。《杨一清集》卷10《后总制类》云：

十一日，真鐮令在官承奉司写字人管珣，已杀孙景文撰成省谕文书，刊成板榜。此时，伊男管律在旁看写[1]（364）。今据前因……杨茂伪铸关防，王得洪伪篆讨贼大将军字样，事于谋反，比之伪造印信，情罪尤重。管珣依听膳写告谕文书，刊榜传播，煽惑人心，情虽胁从，其事亦重。……已行该衙门各捉拿并管律监候[1]（365）。

史料难得，它至少可以说明三个问题：1.说明管律出身官宦世家，父亲管珣为宁夏名人，曾在庆王府承奉司任职。

《嘉靖宁夏新志》云，弘治年间，管珣与宁夏巡抚韩文相友善，时有歌诗唱还。韩文，保定府新城县人，弘治四年（1491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六年致仕。管珣以诗送别：“高卧谢山忘国虑，闲吟陶菊骋诗情。圣朝定复征贤辅，肯遂辞荣掉臂行。”（原诗现收录于《嘉靖宁夏新志》卷1）管珣能够与督抚歌诗往还酬唱，可见当年他在宁夏的社会地位及其文化素养。2.说明其家族在真鐮叛乱受株连。真鐮叛乱是明代中叶宁夏历史上的大事，但究其实际却是一场闹剧。谷应泰当时就指出：“刘瑾威劫大臣，权倾万乘，带刃畜何罗之谋，术士进剿通之论，二世之祸，直须时耳。”按理安化王真鐮“声罪发难，志清君侧”，是替天行道，唯可惜他不是那种匡时济世的人物，“惜其溺巫覡，擅杀命卿，狼狽称戈。既无观变之智，徘徊河上，初无拨乱之心，所以身膏斧钺”，“真鐮一狂悖竖子也”[2]（663）。叛乱很快被平息。真鐮的被杀固然是咎由自取，但此举却株连了许多无辜。管珣曾“依听膳写告谕文书，刊榜传播，煽惑人心，情虽胁从，其事亦重”。而伊男管律也因为傍看写受株连，“已行该衙门各捉拿并管律监候”。可能是刘瑾不久就垮台，勘乱之人都在邀功请赏，加之管珣刊布檄文也仅仅是“依听”，罪不至死，后来的结果当是不了了之，但管律家族所蒙受的牢狱羁押之灾却无法弥消。3.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管律与杨一清的关系。

杨一清是明代中叶著名政治家，曾任内阁首辅。正德五年真鐮叛乱时，他受命与张永一道处理此案。其《西征日记》如实记录了平叛的经过，也数次提到管律。正因为管律与杨一清之间有这样的因缘，管律后来的士子举业竟一帆风顺。《嘉靖宁夏新志》卷1《都察院重修记》载，正德丙子科（1516年），管律以《书》经魁首中举，正德辛巳进士。“律宗师邃庵先生悉之前矣，詎敢僭云”，是见管律与杨一清师生关系之密切。

管律后来官至刑科给事中。文章著述在《嘉靖宁夏新志》中尚能检到断章残编，如《都察院题名续碑》、《重修儒学东号记》、《城铁柱泉碑》以及《汉寿亭侯壮缪关公祠碑》等。从遣辞造句以及文章气势看，学术涵养的确很深，尤其是散见在《嘉靖宁夏新志》各卷之按语，更见其思想之深邃。《重修宁夏新志后序》孟孔章云：“兹志在览，莅政握兵者，得以远考而周知。若廊孔遐，凡建明边略，不待指山画谷而自见焉。岁远事殊，欲救滞补偏者，有所取中而为之损益。此中丞公之知务，而芸庄不负所托也。”[3]（456）又云“博闻有辞，通世故”，时人推崇至此。

二、关于宁夏摆边

宁夏“摆边”是明代宁夏边境防御的主要措施。所谓“摆边”，就是为防止北方蒙古族入侵，将戍边士卒沿长城沟垒排开守卫，谓之“摆边”。《嘉靖宁夏新志》卷3云：“自边墙完工后，具奏尽弃其马，以为减草料之费，息喂养之劳。惟置军夫沿沟垒守之，谓之‘摆边’。”又《明史》卷91《兵三》云：“敕各边军士，每岁九月至明年三月，俱常操练，仍以操过军马及风雪免日奏报。”[4]（2238）又“旧制，总兵夏秋间分驻边堡，谓之‘暗伏’”[4]（2240）云云。宁夏摆边主要有三个因素构成：

（一）宁夏成为军事前线，是明代初年国防策略导致的结果

明王朝洪武年间，为了防止北方蒙古族南下入侵，采取了“亲王塞边”政策。“封肃王于甘州，庆王于宁夏，代王于大同，谷王于宣府，宁王于大宁，辽王于广宁，并燕邸为七，而作藩屏，捍御骄虏。”“凡有不廷，命诸王讨之，所以三十余年胡马不敢南牧，是守在亲藩也。”[5]（89）朱元璋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他对其孙建文帝说：“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貽汝以安。”[6]（16）

但后来的事态发展竟有出洪武意外者。

永乐元年（1403年）弃东胜而守延绥。“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徙之保定。调营州五屯卫于顺义、薊州、平谷、香河、三河，以大宁地界兀良哈。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4]（2236）弃东胜而守延绥造成了严重后果。“先是，固原为内地，所备惟靖虏。及火筛入据河套，遂为敌冲，乃改平凉之开成县为固原州，隶以四卫，设总制府，总陕西三边军务，是以陕北唯甘肃稍安。”[4]（2238）当时人杨一清就曾明确指出：“国初舍受降而卫东胜，已失一面之险。其后又撤东胜而就延绥，则以一面之地遮千余里之冲，遂使河套沃壤弃为虏巢，深山大沙势顾在彼，而宁夏外险反南备河，此陕西北虏之患所以相寻而莫之能解也。”[1]（246）就这样，由于国防政策的失误，导致本来是内地的宁夏，遂成为抵御外部侵略的军事前沿，形成中国历史上独具特点的北部边防重镇。

（二）直接因素是修筑边墙

由于蒙古族势力的渐次强大，经常侵扰北部边界，宁夏遂为首当其冲之地。“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雄杰姿，恃其强暴，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始终云。”[4]（2239）迫不得已，修边墙以抵御。明代宁夏边墙究竟修了多少次，已很难说得清楚，但现存的遗址尚残存四道，且笔者大多实地考察过：

西边城，从今贺兰山西南行，经中卫进甘肃靖远芦沟，长约400余里。北边墙，从贺兰山扁沟起，北经内蒙古鄂托克旗巴音陶亥乡，东逾黄河至河东横城，长约200里。东边城，从横城东行，经盐池至陕西定边。东边墙前后曾修筑过两道。成化十年（1474年）修筑的“河东墙”，自今陶乐县附近的黄河嘴至花马池，长380余里。嘉靖十年（1531年），总制尚书王琼又重新梳理，除加固原有的边墙、在墙的外侧深挖壕堑外，兴武营以东，则从旧边墙南移10余里重新修筑一道。

修筑边墙的耗费是巨大的，更何况屡毁屡修，耗费的人力、物力实在难以数计。据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正月户部、工部称：当年朝廷收的正税500万两，加上外项赋税搜括400余万，共990万钱，而用于“边事”就达800余万。依此核计推算，那么明王朝的军费开支已占当年收入的80%左右，可见当时国家负担军事费用之重。宁夏处于军事前线，修边摆边耗费更是惊人。《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正德、嘉靖年间，“每岁户部运送年例银四万两。弘治中，以粮饷不足，益之以八万两。正德初，刘瑾专擅，仍裁为四万两，至今困之”。同时，“陕西布政司每岁运送夏秋粮一十一万三千九百五十石、草二万三千四百三束。军士冬衣布一十三万五千八百一十六匹，棉花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斤，棉袄、毛袄、鞋、裤五千四百一十六件”[3]（54），这还仅仅是维持费。至于直接修筑边墙则另外拨付，如正德二年（1507年），杨一清奏筑边墙，明政府一次就下拨官银10万两：“敕至，尔即照兵部议过事理，於去年賑济官银内动支十万两，招商纳米，以备食用。”[1]（313）10万两白银在当时是什么样的数目？正德初年宁夏农贸市场每石大米的时价仅值纹银6钱，可见修边筑墙的耗费之巨。

“摆边”对政府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对老百姓来说，是苦难的深渊。《明史》记载：“初，太祖沿边设卫，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遇有警，调他卫军往戍，谓之客兵。永乐间，始命内地军番戍，谓之边班。其后占役逃亡之数多，乃有召募，有改拨，有修守民兵、土兵，而边防日益坏。”[4]（2242）正统初，于谦上奏：“每岁九月至二月，水冷草枯，敌骑出没，乘障卒宜多。若三月至八月，边守自足。乞将两班军，每岁一班，如期放遣。”甘肃总兵蒋贵又言：“沿边墩台，守瞭军更番有例，惟坐事谪发者不许，困苦甚。乞如例践更。”尽管守边将帅想了许多办法，如轮番值班等，毕竟戍边辛苦，人们视戍边为畏途，纷纷逃亡。后来又改征银募兵，“请免戍军三年，每军征银五两四钱，为募兵用”，“久之，所征亦不得”。据史料记载，仅内地河南宁山、南阳、颖上三卫就积欠宁夏镇班银高达5万余两，“是后诸边财力俱尽，敝边极矣”[4]（2242）。

至于“摆边”士卒之艰辛，当时宁夏镇地区广为流传的民谣《边人苦》唱道：“历边颇有年，穷边悉可数。边患每萦心，边差乱如缕。余夫输边粮，壮夫隶边伍。边戍岁无休，边征身何怙。修边妨耕锄，巡边历沙卤。边儿解兵戎，边女废织组。边弊战茧抽丝，边虐早思雨。逃亡度边关，携扶弃边土。”[3]（389）还有什么史料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

古长城是我国建筑史上的辉煌，显示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但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实战效果上看，坦率地说，确实起不了多大作用。第一，修筑费用之巨绝不是一两场战争所能比拟的。这道全靠人工垒筑、路遥万里的防御巨障，即使在今天修筑也非易事，何况加上每年坍塌维修的费用？可谓得不偿失；第二，“摆边”之辛苦。溽暑祁寒之日，风雨晦冥之时，边人征戍的困苦委实难陈。第三，长城虽然修筑坚固，但它却没有御敌于国门之外之功效。倘若对方对着长城的某一点集群攻击，再坚固的城堡都将突破，而只要突破其中一点，其他所谓的千里之守就形同虚设，更何况长城修筑和摆边，就像给守军背上包袱，丢不开，放不下，无法进行机动灵活的运动作战等。因此，长城除了力量的象征意义外，军事上很难有战斗堡垒作用。当年宁夏镇就有诗人指出：“去年空穿堑长城，万人齐出千人死。当时掘地云备胡，胡人履之犹坦途。闻道南侵又西下，韦州固原今有无？”[3]（381）可见其御敌的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管律是宁夏当地人，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三、摆边质疑及其边防对策

管律明确指出，长城是挡不住北方入侵者的。对这种自成化以来“筑墙置戍”、“重门御暴”的修边、摆边的防守功能，他十分怀疑，尤其是对长城“自工完后，具奏尽弃其马，以为减草料之费，息喂养之劳，惟置军夫沿沟垒守之，谓之摆边”的做法尤其不满，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简直是给敌方提供便利。他说：“今摆边之谋，一举而五弊存焉……以五弊之谋，御方强之虏，不资敌之利者几希！”[3]（250）他的理由：1.且不说万里长城的沿线摆边，仅宁夏镇自横城至花马池段止，“连绵360余里，皆虏入寇之路，步计一军，就该一十二万九千六百而后足焉，犹虞稀阔不足为御，更何况备御之军不足十之二三？”摆边的军力根本不够；2.法曰以逸待劳者胜。今“摆边之策，昼夜戒严，疲惫之极，恐非役之以逸道也”。更何况虏情莫测，徇拥众分道而来，谁能抵御；3.军力全用于“摆边”，既没有机动也没有应援，“虏倘呼啸而来，即使我摆边有十万之众，岂能一呼成阵。仓卒之间，必无纪律，首尾前后，势不相援”；4.既为摆边，士卒分散而气力单弱，主将不一而运用参差，难于节制是可以想见的，等等。对这种自困其力的“摆边”做法，管律他实在难以理解，以为自古至今的军事常识都说明，一个孤立无援的堡垒是没有打不破的。“以五弊之谋，御方强之虏，不资敌之利者几希？”抨击执政者腐愚之言语相当犀利，其分析不可谓不深刻。

那么，如何戍守防边呢？管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对策：

1.修德安民是边防戍守的最佳途径。管律认为，古代尚德的君主都鄙武。如果抛弃仁义道德，依仗武力长期陈兵边疆，又无休止地给边疆驻军运送粮草，这既使守卫边疆的将士忍受饥寒，又使内地的百姓困苦不堪，这决不是好办法。对于北方游牧民族，只要朝廷不想抛弃他们，对他们施些仁德，给一些恩惠，他们会心向朝廷，归顺朝廷统治的。这是自古至今戍边行之有效的方略，明代也当不例外。所以当朝廷重臣桂萼《天下图本论》传到宁夏边防时，其中有所谓“陕西三边，惟宁夏西据贺兰山之雄，东据黄河之险，其为备也甚易”的论点云云，管律当即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是谬论。管律说：“此但论其形势尔。近年以来，虏浮洪涛而西渡，视黄河犹坦途，逐水草而转徙，依贺兰为巢穴。东西戒严，无时少缓，为备实难于诸边。兹曰‘为备也甚易’，是忽之矣。忽之则患将至矣。患至而思弥之，又孰其为力耶？故曰‘守在德，不在险’。”[3]（11）为重申这种观点，管律又引时人诗句为证：“当年掘地云备胡，胡人履之犹坦途。闻道南侵又西下，韦州固原今有无？从来贵德不贵险，英雄岂可轻为谋。”特别是“英雄岂可轻为谋”一句，指责权贵大臣的轻率和不负责任。

2.在军事战略上主张收东胜而绥宁夏。宁夏所以成为军事前沿，是朝廷国防战略导致的结果。管律对放弃东胜而守宁夏表示了

强烈不满。他认为：“当是时，其东胜尚为边服，况北虏非特在黄河之外，去开平且千里。边圉之警，岁不恒有，为备虽略，然患犹未生。迨东胜既弃，藩篱已撤，则宁夏之守，不得不肇于永乐之初。”[3]（255）东胜作为战略要地的失去，给明王朝的北部边防造成了严重后果。管律说：“及其虏据河套，日渐内侵，则榆林之设，不得不继于正统之始，由宁夏抵榆林界几四百里，无高山叠涧之依，皆长驱直骋之途，则花马池、兴武营之控制，又岂容缓耶？是二营者，诚秦、雍之垣户，平、巩之襟喉，御备之图，实此为要。虽遮以长城，增以沟垒，然守之不以其人，有若无也，恶足为恃？”“每以战克守固责成效于将领，正所谓巧妇不能成无米之粥也。酿秦、雍、平、巩之患，如疽未溃，孰曰杞人之忧亦或过欤？”[3]（255）如果收复东胜，宁夏何来如此内忧外患？

3. 戍边的要务是整顿卫所堡垒与屯田制度，而不是摆边。 在东胜既失、宁夏成为军事前沿的条件下，管律认为，当前最要紧的是整顿卫所堡垒与屯田制度，而不是摆边。他说：“宁夏镇城合五路，共七卫、三十八所。既广且庶，周回千里。北邻大漠，南挹关秦。东接榆延，西连甘肃，形势犄角，腹里所必赖之大障也。”[3]（49）管律统计，嘉靖年间宁夏全境共设屯堡90个，烽墩485个，是一个点面结合的网状军事系统，倘若这些军事组织都能发挥作用，除北方蒙古大规模入侵难以抵御外，小股入侵者必将限入这些组织泥潭中。但由于当时的国防政策恰恰相反，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筑墙摆边，结果人疲马乏，不堪忍受，“逃亡渡边关，携扶弃边土”。致使这些军事组织形同虚设，基本瘫痪。他举例说：“守瞭之弊亦多端矣，即其大者言之，溽暑祁寒之日，风雨晦冥之时，军法稍缓则偷安误事，贻害非细，况许雇代乎？雇代之人关系非重，幸其无事则已，有失则即遁焉。”[3]（63）堡垒基本上失去作用。

4. 主张组建机动兵团，扼险守关，以逸待劳。 在充分发挥卫所堡垒联防作用下，管律认为组成机动兵团以防不测相当关键。而常备军队应“缮铠冑，修弓矢，砺刀剑，飭车马，增斥堠，军容肃肃。攻将待战而成，守则固裕如矣”[3]（51）；“宜息肩养锐，联络于诸寨，待其来也，相机御之。如不果御，随向往而追逐之，庶鲜胶柱刻舟之诮，亦无自困其力之弊矣”[3]（250）。另外，管律极力主张驻重兵扼守战略要地，以逸待劳。他举例说：“平虏城屏蔽宁夏镇以北一面，北当镇远、打磴诸关口之冲。”[3]（91）“苟失平虏，则无宁夏；无宁夏则无平、固；无平、固则关中骚动，渐及于内地，患不可量矣。求久安之计，先须修打磴口，为复镇远关之渐，次修镇远关，为复黑山营之渐。不然，是垣户不设，欲思堂寝之安，庸可得乎？垣户一固，则沿河、沿山墩台易守而耳目自明，地方有赖。”[3]（16）至于像扼守水源之类要塞，更是管律的坚定主张。他在“城铁柱泉碑”中说：“铁柱泉，日饮数万骑弗之涸。幅员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北虏入寇，往返必饮于兹。是故散掠灵、夏，长驱平、巩，实深籍之”；“御戎上策，其在兹矣。可城之使虏绝饮，固不战自疲”[3]（244）。当然，扼守水源是否像管律想象得如此轻松且不论，但在戈壁沙漠上，没有水也足以让对方不敢轻举妄动，这肯定是事实。

总之，管律为宁夏本土的一介书生，又是在当时局限于“筑墙置戍”为社会主流防御意识的条件下，能够提出这样深刻的国防戍边见解，实属难能可贵。而且他清楚地知道：“边防大计，诚非一人智力之所能尽，创于始者，未必无遗，谋于后继于今者，容可不通塞于时，况又徒建新绩，罔致远图，而益难于为御哉。”但或有一得，也算是对边疆安全的一点贡献。他诚恳地表白：“是故备载斯言，以告志在谋国之君子云。”[3]（94）更见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之心，以至令450年后的今天，笔者在翻读这位先贤著述时，尚难按敬佩与感叹。

谨以此篇祭奠先贤的在天之灵。

参考文献：

- [1] 杨一清.杨一清集 [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3] 胡汝砺编（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 [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 [4] 张廷玉.明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 [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6] 尹守衡.明史窃 [M].北京:中华书局,1997

HE Zhao-ji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Guan Lu, who w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cholars in Ningxia in the Ming Dynasty, composed eight volumes - Ningxia New Records in Jiajing, which have been handed down for generations. The author not only makes some supplement to his life story by making use of new discovered record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n the meaning while probes into his thought of frontier defense, but also analyzes the idea of “defending on morals not on weapons” and “strategic defense if executed, there would be many defects”, proposed by Guan Lu. All his ideas are still worth of studying today.

Key words: Guan Lu' s life; Ninxia frontier defense; questions